

中国现代小说经典文库

大众文艺出版社

彭家煌

CHINA MODERN
NOVEL CLASSICS



中国现代小说经典文库

CHINA MODERN
NOVEL CLASSICS

彭家煌

大象文艺出版社



圾桶去的。上楼时，我循环的默诵着：“难道真一块钱没有吗？——这江湖医生——这骗子。”

在后楼，我不耐久坐，我们就下楼，走过客堂间时，老夏指着我对那医生说：“曾先生。我们又到那个老馆子里去喝酒吧！这位黄先生他请你喝酒。”

“不敢当，不敢当！”他像没骨头似的连忙鞠着躬，还不停的欢笑：“好的，好的，我马上就来，请先走一步。”他送我们到门口，口里叽咕着“好的，好的！”

我们走到街的尽头，那里不大有人走，老夏站住一望，退回好几十步，才发现那酒馆。不过他虽指示给我了，我还是不能一目就了然，因为那酒馆不仅小，而且很模糊，里面两个桌，全用灰尘装饰着。铺台上是两盆不大令人垂涎的发芽豆，和一只不知那天杀的干瘪了的鸡，还是整个的，柜台里竖着四个大酒坛，不，其中有一个是不大看得见人的老太婆就是掌柜的，旁边还有一个鼻眼不分明的半大孩子。她们没有招呼我们，我们也就不客气，从外面桌旁的车夫身边挤进去，占了里面正中的优座。

那孩子终于走拢来问我们要什么，我就要了两斤酒。一面计算着：“十四个子一斤，二四如八，一二如二，来八个子的花生米。身上的四毫钱够开消的。再来点……”再来点什么呢？我的眼光到处一寻找。那真不能使我一下就决定。老夏说：“等曾先生来了再说吧。”好，我们就坐着等。我听见那孩子凑近老太婆叽咕着：“他们是曾先生的朋友。”于是，我向老夏：“他们怎么知道曾先生的；”老夏说：“曾先生是股东，这个店他有五块钱的股。”

不久，曾先生笑嘻嘻的擦着手走进来了。三人就了座，我叫孩子拿酒来，又叫他买了八个子花生米。又叫他设计来了一盆白菜炒肉丝。曾先生又擅自在柜台上弄了一



碟发芽豆，又弄了一碟海蜇皮。于是我们交谈着痛饮起来。

“在夏先生那里听说先生差了一块米钱，心里很过意不去，现在可有了？”

“不要紧，已经赊了一块钱的米，那米店还放心我，我答应明天还他。”曾先生自得的说：“那晚不是有五块房钱吗？因为欠了人家的，人家知道，马上就要去了，唉，没有饭吃，肚子里很难过——我们喝酒吧！”他筛了酒，举起杯来喝。

“哈哈，你说话真有趣！没有饭吃不仅是肚子难过，那简直是要命的事啊！”我说。

“喝酒吧，喝酒吧！”曾先生又举起杯来：“不要紧的我有鸿运酒楼的一张五十块钱的股票。这酒店生意很好。我托朋友押三十块钱；明天晚上可以成功。我还了二十，加了五块利钱，还有五块好多，这是借的印子钱，每月六分的利息。”他又喝了一大口酒，拣了一颗发芽豆。

我们没有说什么，我只全神倾注他的举动。他筛了酒，搔了两下头，把肩耸起来，搓着手低声的苦笑着说：

“没有办法。我们喝酒吧！——喝酒真是好事情，夏先生没有钱，我也没有钱，我们是好朋友——这地方真好，我们要常常来的！”他说着，回头望望后面的老太婆：“这老板是好人，很可怜的！——她常常到我那里看眼睛，我不要她的钱。她钱不够，我就入了五块钱的股。所以，我在这里很随便的，常常来！”

“酒倒是少喝的好，曾先生，我看你的神经刺激得太厉害了，说话也没有条理。——你何不好好生生把你的行业振兴一下，把生活维持下去？”我说。

“不行！”他摇着头笑：“我倒霉，连这个都没有！”他



用手摸着披散的领子两端的窟窿，“不知那一天掉了，我上了一个螺丝，梗在颈子上把肉都刺破了。现在螺丝又俏皮，逃了！”他笑了又喝了几口酒，忽然把脚举起来：“你看，我这个皮鞋，底穿了，前面开了口，走起来，他冒烟。”

我们不禁笑起来。

“你每天也有多少收入喽？”我问。

“没有一定，两毛，四毛，有时还倒贴。穷人多啊！一块钱看一回的。一个月难得有几次。

“像你这样是不行的。你越是那幅倒霉的样子，人家越瞧你不起。上海这鬼世界是全靠外样子，不怕你本事怎样好。”我愤愤地说。

他只温和的笑。

“是呀，你看姚佐顿花柳病医生，从前是甚么样子。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哼，现在，爱多亚路口上半天云里挂着他的招牌，到处张贴了他的广告，随便什么人，只要见了这广告，他不要知道底细就会‘啊，这是个著名的医生！’如是，个个上他那里去，三百五百送给他，花了钱诊不好病，也还是去找他。为的是他的声名大。于今他发财了。曾先生，像你，据前楼的人说，你的手术很不坏，你只要好好的把诊所布置得像个样，把身上弄整齐点，在门口挂个招牌，在弄堂口还挂个更大的，也定一个章程，门诊几何，出诊几何，架子一挺，人家自然不会小看你，像你这样两毛四毛，有时还送诊，有时还……那是……”老夏也说了一大篇。

他只顾喝酒，起首连忙替我们筛，后来就只筛自己的，一定要等干了杯才说话。

“这是没有办法的！”他摇头坚决的说：“他们都是穷



人末！顶多只能收点药钱，总而言之，是阔人就没一个肯上我的门的。我会看像，我会外科，有些人我知道是流氓，绑票匪，我常常白给他们治伤。他们呢，诊好了，去啦，还用片子介绍别人来，也是不给钱的。我有什么办法呢？——你们以为我是好人吗？其实我也很坏的，是穷人，到我这里来，他们都是别处诊不好的，他们没有钱谁给他诊，是这种人，我是欢喜给好药，一次二次就好了，阔人就不同了，一次诊得好的，我给他分做几次诊，多弄他几个钱，其实我是很坏的。”

“你这样待人家，人家把你当呆子，像你这样的人，是不能存在的。我劝你以后还是把牌子挂出来，好好的干一下，免得受苦！”我说。

他还是温和的笑，连连把酒往口里送，酒完了，又再叫两斤。

“是的，牌子原先挂的，在弄堂外头，因为警察要捐钱，才取下来的。”

“哈哈，假使人家说你不该吃饭，你就把自己的颈子割了吗？这是太笑话了！”我说。

他也笑，已经很醉了，话便滔滔不绝。

“原先我生意很好，每月赚二百多块钱，那不是现在这个地方，这是去年搬来的。我赚了钱就把门面扩充起来，我没有老婆，订是订的，因为她要八百块钱办嫁装，我没有，他就另外嫁人了。我把老娘由乡下接来住，请了两个听差，有一个不能做事。这听差原先有田在乡下，给人家骗了，很可怜，我就把他带到这里来，他是个呆子——那时候，我的日子很好过，门诊是一块二，没有钱的就减半，看人说话。不料去年革命，我的诊所烧得干干净净，好，没有想到这个革命把我打倒了。搬到这里之后，



起首还敷衍得过去，凑巧，闸北办市政，一条马路修上大半年，交通断绝了，简直没有人上门。好，这个市政又把我打倒了。光修马路还不打紧，三四月间落起黄霉雨来，你想谁肯爬过烂泥堆里走过丈多深的水沟到我这里来呢？这里又这样偏僻！好，这个黄霉雨又把我打倒了。房钱欠七个月，生意没有，我吃的是身上的衣服，是老娘的皮袍子，是木器。有一次听差的走了，后门口扒手进来把老娘的棉衣也偷了！——是的，我牌子是有的，弄堂外有块大的，前门的壁上写着‘照原眼科’四个大字，但是我给不起捐钱，警察天天来要，起首我就把外面的牌子取下了。昨天他又来了。我就把墙上的字也粉了，省得他来麻烦。可是牌子一取消，就简直更没有瞎子能找得着我了。好，这个警察捐又把我打倒了。这就可以太平了吧，但是那个印子钱逼得很紧，所以——我近来不快乐，睡不了觉，头痛，有了钱就喝酒。我想把牌子挂在这酒店的楼上，夏先生噢，我们两个无论如何在一起。这地方真好，慢慢的我们会发达起来的！——不过，现在，——唉！——我还有两个好朋友，都死了。我晚上眼睛一闭，就看见他们两个。唉，好人。——阔朋友我也有的，那是姓何的，从前和我很好。如今有几十万，白克路有洋房。上次我买点东西去送他，他不见，他怕是绑票的。——是的，我是要饭的，你们看这幅样子，——我常常半夜里……”他说到这里，眼睛朝天，两手合拱着：“爬起来，睁开眼睛，是的，我是晚上才喜欢睁开眼睛。因为我不愿看不见什么，我对天说：天啦，你把我的寿命减少二十年吧，切莫再使我是这样子啊。”

他不再笑了，两手撑着头，慢慢的伏在桌子上。我们全都沉默着，忽然他又抬起头来说：“这地方真好，我们



每晚都要来的噢，夏先生！”

“不来了，今晚我请你到鸿运楼吧！”我说。

很晚了，曾先生还要酒，我们不承认，我叫孩子来算账，曾先生就立起来用手一挥，好像这应该归他出，我也就不客气，给了二百四小账就往外走。我回头向柜台一看，看见那孩子仿佛用蝌蚪文在簿子上写着：“曾先生欠……”

走到街上，我拒绝他送我，他说：“不要紧的，我们通晚不睡觉不要紧的，睡觉是受罪，在外面走走很快乐啊！”到了我自己的弄堂口，我和他告别。我在十二步之外还听见他的声音：“夏先生，我们再到那酒馆里去坐坐吧！”

我就是这样认识了曾医生了。

第二晚，我原打算请他到鸿运楼去的，不知怎样我忽然变了计，只随便买点干牛肉之类的下酒菜请他到家里喝。他起首不肯去，后来虽是去了，但是不再多说话，只低着头在房里徘徊。我问他：“股票押了吗？”

“没有，要明天听回信。”

“今天有生意吗？”

“有的，一块假洋钱。”他掏出那洋钱来后，笑着说：“铅的，分量轻，放在手里就知道。”

“上海人真坏，看病的钱也给假的！——那末，你不能叫他换吗？”我老婆不平的说。

“马马虎虎，那个人送我假洋钱当然也是没有钱喽！”

“是没有钱就送诊也可以的，给假洋钱你不妨责备他的！”老夏很反对他的态度。在我家里，酒也喝得不少，但他不多说话，话里也没有惊人的句子。不过我们都觉着他的神经的确纷乱了，每句话是牛头对马嘴的，因为我知



道他昨晚送我回家后又在酒馆里去喝了一顿，又因为被窝放在别处去了，只伏在椅子上看书，度过这寒宵。他呢，也知道自己这次是失了一个不小的败，所以不高兴多说话。不过，他也不十分沮丧，他还有无穷的希望呢，他有一张五十块钱的股票，明天那张股票总会押了的！

第二天晚上，天下着毛毛雨，我走到他那里，我看见那替他押股票的人说，事情又变了卦，要过一个礼拜听回信。总之，这是推脱的话，这股票肯有人要，五十元只押三十元，六分息也没有人要，而且那印子钱别人不肯再放了，非马上收回不可的。我很替这医生不平：“二三十块钱的事有这样难吗？又不是凭空讨人家的，曾先生，你给股票我，我明天去试试。”

“好，谢谢！”他将股票给我，深深的一揖。

天还是下着毛毛雨，很冷，我一早搭车到江湾，想找几个朋友，因为那些朋友起码赚二三百元一月，又没家眷，就是一人力量不够，几个人总可以凑足的，如果不放心，就由我负责，然而结果是：“我也只能勉强维持生活，如果□□在这里，那就没有问题啦！”

我回到曾医生家，走进他的寝室，把这消息告诉他，把股票退给他，答应再想法，可是他睡在床上起不来，因为房里有个姑娘，我听他说过有个朋友介绍一个女人给他，他曾因为自己没有钱，关照那姑娘别再上他那儿去的，现在她又来了。

“姑娘，请你出去一下。”他说着，那姑娘就走了。

于是他抬起身来，掀开盖在身上的惟一的外套，把那件窟窿累累的绒绳褂扯得很周正。披上外套，伸出穿着无底袜的脚来，费了许多工夫，才穿好靴，因为不如是，那袜是不容易就范的，此外我还发现他腿上失去了那条西装



裤。

我们同在客堂里坐，他还是笑，鞠着躬说：“对不起你，这样的雨天，害得你跑江湾！”我和他谈了很久，我没有坐，因为他的藤椅也不见了，圆台边只剩了那原先摆在后房的三脚椅。

我回家了，下午又向另一个有钱的朋友打主意，更不成，他说他并不干这样的生意。我只好回曾医生一个信，就再没有到他那儿去了，老实话，我不敢再见他。

过几天，老夏又来了，我问及这医生，他说：“近来他再不喝酒了，脸也肿了。山东人天天来吵，要那笔钱，很凶的。这两天他没有在家，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大概是害怕这山东人吧。”

我不敢再问了，我只尽量的沉思：为什么不藏在黑暗的破屋里，却走到外面去呢？怀着忧伤，到荒野徘徊去了吗？到山顶恸地呼天，向北风求助去了吗？到黄浦江边痛饮去了吗？他欢喜孤独，连好友老夏也不要了吗？连……

“这个人很可怜。老黄，你是欢喜把自己妻子儿子都上小说的，也把他上一上小说吧。哈哈！”

“但是——唉，在这年头，这玩意早已不时髦了，这事情，太平淡了，上了小说不会有人看的。”

我禁抑着奔放的热情坚决的这样回答。

一九二八，一二，二五日于上海。

（选自短篇小说集《平淡的事》）



改 革

曙光还没打定主意惠临到窗子上，韦公听见爆竹到处响，就不管昨晚摩麻雀、掷骰子闹得太晚，连眼皮还不曾合拢一回，便也从温暖的被里挣了起来。这天不是接到党部里开紧急会议的通知；也不是得了共产党要暴动的消息，值得去报告戒严司令，好邀一笔重赏；也不是那不能维持生活的纱厂工人要大罢工，得去弹压，解散；更不是有什么好玩的事体如杀头着火之类可看，值得我们这位好同志那末早就起床的。只因那天是我们中华民国旧历十七年的元旦。

原来这天比“五卅”“五七”和一切什么纪念日都重要。虽则我们的国度里那“新历”早就跟着一大群的新文化从海外输入了，每年弄出两个元旦来，然而本质上，新历元旦压根儿就赶不上旧历元旦那末切于实用，那末真正算得过年。那只是一般好高骛远的浅薄少年拿来应卯的，我们从这上面就可批判出它俩的优劣来：比如过新历年，大家不过发发贺年片，各机关冷冷清清放三五天假，见了朋友不过和平常一样点点头，握握手，懂洋泾浜的说一声，“A Happy New Year For You”。至于稳健份子他才不肯那末丢脸呢！这时节，长辈或上司那边你去是自然应该去贺贺，可是你见了他们，你只有呆坐寒暄的分儿，你总不好意思来别的表示恭敬的花头的。如果到了旧历元旦，那你就不能这样简慢这般大意啦。不怕你曾过过一回新历



年，你还得慎重其事的再过一回旧历年才算过足了瘾；而且所有的事业、经营、讨账、催款、办年货、送人情以及扫除灰尘等大事都得在除夕前结束。“一年之计在于春，”你辛苦了一年，那时你应该把一切弄个清爽，腾出大部分的精神和辰光从元旦起专心一意的娱乐个把月，那差不多和张勋的军队打开了南京准弟兄们大抢三天一样，这时节官厅连叫化子，修马路的囚犯，都恩准他们在街上赌钱，掷骰子，上等人更不用说，只要你不是有共产嫌疑，写文字讥评党国要人，那真是小雀子出了笼，再自由没有的。不过天大的事可在这时节搁起，但那“拜年”你无论如何懈怠不得，因为过新历元旦时你不曾拜，也不作兴拜，发了贺年片是空的，只有这时节你才能一家家去登门作揖，在长辈或上司前行那叩头或九十度的鞠躬礼，一句话，你那满肚子的恭敬礼貌也只有这时才是行的惟一机会。我们的韦公就为着这缘故，他得赶早到一个中央委员老爷那边去一趟。

那中央委员老爷爱住在离都市二三十里的一个偏僻地方，到他家里去虽可乘火车，但下车后还要走半里又迂回又臭的烂泥路，乘公共汽车或洋车吧，可是太不合算。在委员老爷自己，固然是恶器杂，爱山水，有隐士之风，到那儿逛逛有自备的摩托卡，进京开会有国备的专车，但一般远地的小人物去拜访他，那就很费事啦。如果误了钟点，赶不上火车，得掏许多的血本来乘汽车或洋车，在半路上还怕给小瘪三捉了肥猪，平常没事儿不去拜访他还不觉着怪难过的，何况是时行拜年的旧历元旦呢。他充军充到那世上，真是故意跟韦公这般人捣乱的。

那从民国十六年就飞起的细雨，这时还像哭丧人的泪儿洒个不住；那从除夕就发作了的狂风也不看看节气，好



像刮起了兴头还在空中放肆的乱吼；街上的店家都像吃饱了的老牛，闭了大嘴一般，将财门开了之后，又紧紧的封着；马路旁的赌摊也还不曾摆出一个来，只有每家屋檐下那疏疏密密的通宵未睡的孩子们还在高兴的放着冲天爆。不瞒人，我们这位穿戴齐全的韦公出门时，天还只有点毛毛亮。这不纯然因为是辰光早，一大半也是乌云弥漫了满天，雨中还夹杂着雪雹，将天色弄暗淡了的缘故呢！

生怕浸湿皮鞋，韦公就捡没有水的石块将脚尖踏上去，那好似点水的蜻蜓，又像轻手轻脚的窃贼，每一步都得使身体一伸一缩，那姿势可以说是跳吧，他就几步跳到附近一个弄堂里，敲敲一家人家的后门。因为那委员老爷不是他私有的，他到他那边去不通知同志一声，似乎是自私自利，虽然同志们不一定能够同他一道去。好在那家人家还不曾睡觉，他就很顺利的走进去，一直冲上楼，推开门用随便的口气问：“喂，黄同志，邹同志，怎么还不起来，老头子那边也得走一趟吧！”

黄同志早就张着耳朵听，他们原是不拘礼貌的，这时他只瞪着眼呆呆的望着床前的韦公呆笑，许久才装出个不信禁忌的样子说：“见鬼啦，这末早就起来！——喂，告诉你，昨晚我输了十八块，真背时！”

邹同志装着睡着了，弓着腿不动，像葬在那被里，但一听到“老头子”，他终于像蚯蚓样扭了两扭，掀开被露出那红眼睛，又伸出一只手来，“唔——”他伸了个懒腰说：“今天早上五点钟才睡，唉——实在是——”

黄同志就揭穿他那种虚伪的不高兴说：“叹什么气呀！三十四块钱进了袋还有什么不舒服的！”

韦公是急急于要走的，他就不耐烦的说：“不和你们谈这个，喂，你们究竟怎么样啦？”



邹同志说：“别急呀，自然要去的，——是的，一道去省事啊！”

好啦，不久，他们三人一路到车站，上了火车。车厢一大半是空的，可以说是一列贺年的专车吧。在车中他们谈了些昨晚牌九输赢的事：黄同志悔不该一点多钟的时候还不收手，因为那时他赢了好几十；邹同志就懊恼着没有下了重注，因为他的手气始终就没衰颓过。韦公干的是小玩意，没有可说的。大家谈了一阵，不免浏览些铁路边的新年的景色。那景色虽在乌云压压雨雪纷飞的不清爽的光线之中，但在他们的心目里却各自有无边的新气象：韦公呢，他早就不愿株守着月薪六十元的位职，最好中央委员老爷调他充当个一等科员；黄同志资格高些，他就想补一个肥缺的县知事，弄上三五万好什么事都不干，有吃有住，幸福一辈子；邹同志却为着他那赋闲大半年了的堂弟打算。听说时局会有大变动，他们这位中央委员老爷有任省政府主席的消息，老天爷，他们这几位亲信想当权，不趁着机会活动一下还成，而活动的步骤——这“拜年”显然不是闹着玩儿的。

下车时，因为到了野外，那风势更加大，呼呼的只往面部压，几乎将他们那鼻孔的气流顶回去，细雨是像农夫洒石灰样四面八方往下盖，路又泥泞得很，不知给什么马蹄子踏得那末烂，简直伸不了脚，又没有一个人走运的洋车夫晓得这里三个雇主要照顾他们。他们只好迎着北风打冲锋，左一步右一脚的低着头，小心翼翼的拣路走，那怕眼睛里给风拂起了泪波，红鼻孔给冻得清流淅沥的，也始终不敢将头躲在大衣里偷一会子安，那勇敢奋斗的精神着实可佩服，那点丹诚也真够撼动天地的。

一脚没走好泥水溅了一身的黄同志忽然生起气来了：



“真背时，阳历元旦我们到老头子那边去碰了这样的天气，现在又这样，真背时！”

因为这位同志受了飞灾，韦公觉着那末早，那末天气不好，跑到这野外，是他的主动，他就不能不像是为自己开释似的对于这“拜年”加一点骑墙的论调：

“拜年实在没意思，不过——我们却是和普通一般人不同，顶多见了师长作作揖，敷衍敷衍了事，况且老头子这边真是生亲了，没法儿的。至于真真拜年，我是十几年没干过这玩意。”

邹同志因为某种心理所驱使，即刻同情的说：“是啊，我一向就反对，那真无聊！”

黄同志也说：“我也是十几年没……”

原来这三位都是革命的急先锋，虽在革命事业倥偬之际，无暇对于“拜年”的命认真的，彻底的来革一下，然而他们却早就将跪拜革成为作揖。谈锋既经转到“拜年”上，于是还来了一阵对于从前那跪拜的攻击与嘲笑！

“讲起旧式的拜年，哈哈！”邹同志开头说：“那真笑话！尤其乡下人，到了大正初一，照例，早饭是不吃的，惟一的大事是拜年。万事落后的妇女自然要到初三四才出门，那叫做‘出行’，出行时还放爆竹。男子汉呢，早晨起来，一洗完脸就把那件月蓝竹布半截单长褂从箱底下翻出来，几下往身上一罩，拖在半天云里像一把伞，再阔气一点的就加了一件上了霉又皱折不堪的青布旧马褂，比长褂稍许短一点，带了兄弟和大的孩子们，七八个一路拜起年来。照老规矩是‘初一崽，初二郎，初三初四拜地方，’但是他们拜完了自己家里的长辈，拜完了邻舍，就拜发了势啦，还管得那套，大队一开出门就挨家子拜。一走近人家的屋门口，还在大门外头，那长于言谈的走头，



那算是队长，他就敞开喉咙嚷起来：‘常家二爹呢，请到大厅上拜年啊！’那里头虽是在拉屎，或是在喂猪牛，但他们是时时刻刻提防着这个的，也就什么都丢在一边，吁吁喘喘的嚷着奔出来打接应：‘那不敢当呢！到了就是年，到了就是年！哈，真是，太客气了，到火房里请坐，到火房里请坐！’这边是不因为人家推让就将拜年模糊一点的，自然见了人就倒下去，平辈见了就作作揖，孩子们那就硬要跪下去像冬瓜样在地下打滚，哈，哈哈！那边回了礼之后，这边又得先开口：‘恭喜你老人家过得热闹年啊！’那边就得：‘好说，好说！彼此一样，彼此一样，’这边又是：‘你老人家新岁健旺啊！’那边就得：‘托福，托福！’哈哈！天天见面，甚至时时在一块，只隔了一晚就忽然客气起来，绕弯儿问安，真笑话！真碰了鬼！”邹同志说时，口沫直往嘴边涌，两手指东画西，描摹得活像，打着湖南的土调模仿两边的口气，抑扬啊，顿挫啊……使人听了见了，真像亲自听见看见那些怪物在那里哈哈嘿嚙作拱打揖的，于是博得黄同志的同情的微笑和韦公的赞言：

“好描写，老邹你真形容得刻苦，不但是革命家，还是文学家呢！哈哈！”

“也不是故意形容，”邹同志接着说：“实在的，这情形在乡下到处看得见。还有，拜了年之后，免不得到火房里坐坐喽！吃芝麻豆子茶啊，嗑瓜子啊，喝酒啊，再客气点的，还留吃饭。至于孩子们喝不了酒的，就每人分一碗薯片豆子，他们吃不了就灌在他们的口袋里，好在他们的口袋大，三两斤货色尽盛得下，他妈故意为他做大些就为的这一手。——到了第二家又是老套头。这样一家一家拜下去，大人们是灌得醉醺醺的像关公，孩子们就吃得皮黄骨瘦，吃饭来翻起眼睛看天，差不多正月那一晌，个个



都得害一场积食病，妈的，真造孽！——唉！——还有那些住在城里的大户人家，老头子的姨太太讨上好几房，多半是班子里接出来的，十几岁的妹子，论起来你得喊她‘叔哀姐’，拜起年来，她是长辈，你到他家里去喊‘到大厅上拜年’，难道真等她走出来才拜，还不是没头没脑的钻近门帘子去，不管她还在床上裤子都没穿好，你也只好红着脸在门弯里的马桶旁边把头磕下去，那怕你穿的是新衣，那地上又有一堆鸡屎或一泡浓痰，你还好意思不下礼！妈的，这宗制度才看见！才该杀！”愤世嫉俗的邹同志，这时便将头左摇右摆的低下去，非常的感慨系之，末后还将“唉！——”做了这篇高谈的结论。

韦公好像也要将“拜年”臭骂一顿似的，他笑了笑接着说：“我。……”但同时黄同志也笑容满面的在说：“我……”于是韦公就让了一步说：“好，好，你说，你说。”

黄同志发言素主慎重，无论做什么，脚步站得稳，从来没有人说他不革命或反革命。他为人再伶俐，再老练，再能干没有的，虽则在除夕输了钱，那完全是气运坏。他说：

“这是好几年前的事：那时我记得我是念四岁，在大学堂里念书，因为离家近，所以不能不回家去过年。正月初一的早晨，照例爹爹妈妈和兄弟侄子们都得向祖母拜年的，她是八十多岁的活祖宗，顶欢喜见子孙向她拜年的，那个没向她拜年，在吃饭的时候，她指名说那个于今是不认得大人啦，那个于今自己能够赚饭吃啦。闭那宗气比挨几个耳光还难受。爹爹妈妈都向她拜，难道我不拜，我拗得过她？——好，当大家都到了大厅上，我就出了个主意。我就向他们说：‘我来提一个议，你们一个一个就祖母拜年，太麻烦，她老人难得回礼，你们顶好站成一个队伍，一齐向祖母拜。’他们都同意了。我就毛遂自荐作一